张卫星：相信秦始皇兵马俑会“复活”

者探源

□ 张卫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馆员，曾任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

秦始皇兵马俑。 视觉中国供图

我从1995年参加工作就在秦始皇陵，参与发掘过兵马俑二号坑。2009年之后的10年，我负责主持秦皇陵园的考古工作。

在《国家宝藏》节目中，张国立评价我是“最浪漫的考古人”，因为我说相信这些陶俑会复活，陵园的一切都会复活。尽管在现代人眼里，这些只是不能动的明器，但考古需要追求一种代入感。

站在秦始皇的角度来理解这些遗物遗迹，它们一定是会活起来的。秦始皇设置了各种陪葬坑，有军队、车马、百戏、水禽等，想在死后的世界享用。陵墓是秦始皇死后的家，他把兵马俑设在一个相对较偏的位置，是因为家里不应该有战争的纷扰。代入古人的视角，才能发现我们用现代人的眼睛看不到的历史细节。

和刘邦是“老乡”，曾想学外语和经贸

1970年，我出生在江苏省徐州市沛县。汉高祖刘邦就是从这儿发迹，自称“沛公”。当地人对这个事情津津乐道。

我的历史启蒙是从爷爷的故事开始的。他是一名乡村民办教师，我在他身上看到，读书是受人尊重的一件事。那个年代一般人家不会主动买书，我到现在还保留着他的一套《古代文选》，很厚的两本，应该是他当时花了大价钱买的。

那个年代没有空调，傍晚人们就在房前屋后乘凉。小孩爱听故事，老人就在这时候讲给他们听。那时候我对“祖先”很好奇，就问我爷爷，“我们祖上是干啥的”“我们张姓的祖先有没有啥名人”……他就聊到，我们有一个祖先是元朝的大将，身份地位很高，嫉恶如仇。

从小学起，我就很爱学习，到了高年级甚至觉得走读浪费时间，搬去和学校的一位老师一起住。后来，我母亲花了很大力气把我从村小转到了城镇小学。虽然上学路程变远了，要一路小跑40分钟，但我也因此有了考上沛县最好中学的可能。

到了高中，我的历史成绩很好。那时候喜欢历史，是觉得它有一定的逻辑，甚至还可以把前因后果串联起来。但高考后填志愿，我没有选历史专业。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和外语是最热门的专业，我就想选这两个，觉得比较风光，同时苏南、上海一带的大学是优先选择。

结果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傻眼了，被调剂到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这压根儿不是我想去的学校，也不是我想学的专业，我甚至不知道西北大学在哪儿。后来上大学的表哥告诉我，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侯外庐）当过西北大学的校长，我才觉得这学校还是不差的。

2013年5月24日，张卫星在百戏俑坑发掘时整理出土陶俑。 张卫星供图

2016年，秦始皇帝陵遗址道路发掘现场。 张卫星供图

2019年3月14日，张卫星在研究新发现的泡钉俑。 张卫星供图

1991年，我离开徐州，在绿皮火车上“哐当”了一夜，来到西安上学。我深刻地记得，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冷到没办法了，只好叫家里再给我寄一床被子过来，盖两床被子才能睡觉。

“稀里糊涂”学考古，一开始就是挖土

我入学的时候，考古是小众又冷门的专业。西北大学考古专业那一年共录取了14人，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是服从调剂来的。大家不知道考古具体是干啥，第一年稀里糊涂的，甚至有些抱怨。

我虽然对历史感兴趣，但考古和历史不一样。考古专业除了历史年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和历史专业一样学之外，其他就“分道扬镳”了。比如仰韶文化，我们就要学它在哪个地方分布、发现哪些遗址、遗址多大面积、出土了什么器物……还要学摄影绘图这些技术。我中学喜欢的历史是“纸”，而考古学的是“物”。

大学第一学期讲旧石器考古，讲一百万年到几十万年之前的元谋人、蓝田人、石头、石片之类，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后来几个学期到了夏商周、战国秦汉、宋元明清的考古，才开始有些兴趣。大三，我们有了第一次实习，去河南三门峡的班村遗址实地发掘。那里是仰韶文化最早定名的地方，也是在那儿，我才真正了解考古是怎么回事。

一开始就是挖土，可能所有考古人都有这个经历。我们一开始也很兴奋，自己抡着铲子一遍遍在那儿挖。

其他同学都在遗址核心区，出土的东西特别多。仰韶时期的陶器是红陶，同学一天能挖出几袋子陶片，下工的时候就用架子车装上，一车一车往回拉。为了解决遗址的边界问题，我被老师安排到遗址的边缘。这里一天只出十几片，手提着一小袋就回去了，我也当宝贝似的。后来在我负责的那个区域，果真发现了一个大的壕沟！

我们考古队的驻地是一所废弃的小学校，有宿舍和食堂，食堂的伙食还不错。当时带队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要在这里搞一块新考古学学派的“试验田”，用新的技术手段、新的理念来解决考古问题。我们就在那个小学的教室里听考古大咖们的讲座。

野外考古没有工作日休息日之分，下雨天就是休息天——但也只是意味着田野工作休息了，整理材料的工作还要做。考虑到遗址和文物的保护，野外考古一般选择春秋两季发掘，避开多雨暴晒的夏季和降雪冻土的冬季。于是，人也跟着沾点儿光，到了很热的时候，我们的考古田野实习就结束了。

初遇兵马俑，清理出土文物和挖红薯有什么相似之处

对考古而言，西安有天然的优势。大四那年，听老师说秦始皇兵马俑那儿在做考古，我们几个同学就打算过去帮忙。到了才知道，竟然是兵马俑二号坑的正式发掘！他们从1993年年底就开始，1994年迎来了大规模发掘。

二号坑的面积特别大，有6000多平方米。我们去的时候，坑上方建了一个巨大的展厅，施工还没有结束，灯光照明也不好，就像一个大建筑工地。当时二号坑还在取上层表土的阶段，我们就在这个展厅之下跟着老师做清理和发掘，蹲在那儿，拿一个小手铲，一铲一铲慢慢清理，断断续续在这儿待了半年。

在休息时间，我才去看了壮观的一号坑。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兵马俑，跟课本上看到图片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么大体量，给人的震撼和冲击力，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当时一号坑中间还穿过一道悬空的人行通道，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兵马俑。

如果说挖土是考古第一个层次的工作，那清理就是第二个层次，也就是精细地挖土。挖到一定程度，快发现遗物遗迹了，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会先用铁锹把土铲平，铲出一个光滑的面，然后用手铲把它刮平。在铲和刮的过程中，就能分辨土的颜色、质地、密度的不同，土中有没有夹杂物，然后根据这些来判断哪里是遗迹、哪里是自然堆积。

一铲下去，如果土很实在，那它可能没有被动过；如果土是虚的，说明有可能被人为翻动过。那就要先把它的范围找出来，然后用小铲子和小竹签把它的形状清理和剥离出来；器物暴露后，不能动，先画图照相；采集完资料，继续从上往下一层层挖，直到器物完全暴露，再将其全部收集。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小视频，有人用考古的方法挖红薯：先把红薯秧子弄到一边，然后慢慢往下挖；红薯露头后，判断这一堆大概有多大，慢慢把周围的土从上往下一层层挖掉，清理完周围的土后，这一堆红薯就全部露出来，一提，这堆红薯就提走了，不能红薯刚露个头，就整个儿从地里薅起来。考古清理器物，大概就是这个原理。

外行人可能会想，有没有一种技术可以在考古发掘之前穿透地面去探测遗迹遗物有多深？我们其实一直在发展这种技术，但目前都不理想。技术探测只能探到大概位置，至于这个文物具体啥样子，只能通过发掘得知，就跟现在大家说的开盲盒一样。

到了大学毕业，我的想法已经转变，觉得干考古有意思，比学历史还有意思。我进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工作，当时班上14个同学，留在陕西的外省人就我一个。记得当时老师说，“欢迎你留下来支援陕西”，没想到我就在陕西待了快一辈子。

博物馆的驻地在一个偏远乡村，离临潼县城还有七八公里。我1997年结婚，和妻子住在博物馆，一直到2010年左右才搬出来。

秦始皇陵有群穿“超短裙”的陶俑

参加工作以来，我印象最深的是百戏俑坑的发掘。在这之前，我们都习惯性地以为秦始皇陵的陶俑就是兵马俑那个样子；结果1999年试掘出土的陶俑，多数只穿了一条短裤、短裙，甚至是超短裙。有的体型特别魁梧，虽然没有发现头部，但已高达一米八，肌肉也很发达，一看就是大力士的形象；有的体型瘦小，不加头部只有一米五。无论高大的还是瘦小的，都在做各种动作，这就比较奇怪了。

不过，在秦始皇陵做考古，发现再特殊、再精美的东西都不足为奇。

从2010年起，我们对陪葬坑进行整体发掘，又发现了一批陶俑，到现在还没有修复完。最近几件修复好的陶俑中，有一个姿态像坐在椅子上，小腿和大腿、大腿和上身都呈90度。这种坐姿在今天很常见，但秦汉时期的坐一般是跪坐、席地而坐，像这样有坐具的“高坐”非常少见。还有一件陶俑在做鲤鱼打挺的动作，仰面跪伏在地上，腰部拱起来。

根据文献记载，秦朝宫廷有一种叫作“角抵”的游戏，类似今天的摔跤游戏，到了东汉发展成为“百戏”，相当于现在的杂技，有倒立、爬竿等。后来我们判断，这批陶俑很可能是在宫廷里面从事表演活动的人员，因此定名为“百戏俑”。

百戏俑坑后来的发掘是我全程带队参与，虽然很兴奋，但也惴惴不安。虽然前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没有挖开，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始终抱着一种谨慎的态度、诚惶诚恐地工作。百戏俑坑有三条坑道，其中两条坑道出土的文物都没有想象中多。

考古其实是一个可以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的领域——当然得是合理的想象。我们用遗迹遗物去链接古人，这中间有无数个环节，你可以去一一验证自己的想象。百戏俑出土后，有一些西方学者就猜想，这些接近裸体的陶俑是不是和古希腊的雕塑有关，BBC拍的纪录片就脑洞大开，设计了一个环节——让秦始皇看到了古希腊雕塑。

考古不是“挖宝”，终极目的是复原历史

考古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发掘，把遗物遗迹客观地呈现出来，这是考古发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比较少，需要在全国各地通过大量的考古发掘来建立研究的谱系和序列，比如，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等。当这些空白填补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去研究了。

考古界有一个说法，“考古并不是挖宝”。并不是发现的越多越好，我们工作的目的是怎样把这些发现串联起来、解释清楚。1996年以后，兵马俑二号坑大规模的发掘就停了，当时的老馆长袁仲一先生说，挖掘到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他提出过一个考古的“三三制”原则：整体上发掘三分之一，把它研究透，剩下的三分之二保留下来，留给子孙后代，等到有了更完备的研究和技术，再进一步发掘。因为考古发掘有带来破坏的风险，层层揭开的物理过程是不可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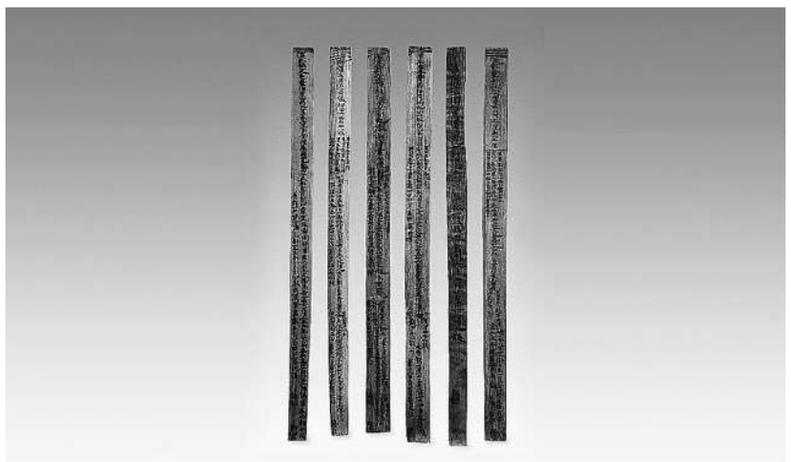
秦始皇陵60多年来发现了600多个遗迹，包括建筑遗址、陪葬坑、陪葬墓等，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考古阐释。考古的终极目的是复原历史，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物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考古归根结底，是一个认识人的学科。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秦始皇陵系统性的研究工作，取得的成果也是颠覆性的，不仅弥补了遗存布局等方面的空白，也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在阐释的层面上比前人走得更远了一步。

来西安旅游过的朋友可能知道，凉皮、肉夹馍和冰峰汽水被称为“三秦套餐”。我一直想做出一份自己的“三秦套餐”，是对秦始皇陵、秦始皇、秦帝国的深入研究。在这一点上，我不知疲倦。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杜佳冰根据张卫星口述整理）

出土简牍透露隐秘历史：普通人在三国怎么生活



嘉禾吏民田家莂。莂是可剖分的契约文书，一式两份或多份。归档时，这些田家莂被编连成册，这种简册形成了我国竖排本书的雏形。从券书上我们可以看出孙吴时长沙郡临湘县佃户租佃土地的数量及须向官府交纳钱粮、布匹等赋税的数额。 长沙简牍博物馆供图

编者按

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说：“环顾历史，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像一股青烟消失了。”历史与我们渐行渐远，历史人物成了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三国，在话本、小说、戏剧的演绎之下，三国故事脍炙人口，真正的三国历史却越来越模糊。

实际上，历史并不遥远，目前全国分布着超过500处三国遗迹，包括古城址、古战场、古墓葬、古道、碑刻、祠庙以及纪念性的遗迹，还有众多博物馆收藏有三国时代的文物。国学即日起开“重返三国现场”专栏，重返现场，将这些遗迹与文物拼合起来，我们也许可以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三国时代，聆听1800年之前在这片土地上回响过的激荡之声。

□ 成 长

我们从史书中看到的三国历史，大多是帝王将相的传记，选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视角，而那些三国时代普通人的生存境遇、生活样貌，大多为时间所掩埋，寂然无声。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现，让三国历史获得了可贵的“基层视角”。

建筑工地惊现三国吴简，数量超过全国已出土总和

1996年10月，为配合市政建设，湖南省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走马楼街平和堂商厦建筑工地开展考古调查勘探。一名考古人员在施工现场的淤泥中发现了一块长约20厘米的木板，木板上的字迹隐约可见，这很可能是一枚古代简牍。

根据这一线索，考古人员在建设工地东南侧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椭圆形水坑，经判断是一口废弃的古代井窖。在被水浸泡的古井内，又发现大量的简牍层叠在一起，数量惊人。然而这时，这一区域已经被工程挖掘机破坏，一部分可能带有简牍的渣土已经被挖掘运走。考古人员连忙兵分两路，一路守住现场，另一路直奔长沙城东郊5公里外的湘湖渔场卸渣场，寻找倾倒于此的井中淤泥，抢救简牍。经过十多天的努力，大部分简牍得以保全。

这座古井被编号为J22，出土简牍经过清理统计，总数超过13万枚，这一数量超过此前全国已出土古代简牍的总和。从简牍中所记载的年号来看，上起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下至吴大帝孙权嘉禾六年（237年），比较集中在东吴黄龙至嘉禾年间，经专家讨论议定，这批简牍被定名为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

简牍是古老的书写材质，以木、竹为材料，经过削切、打磨、杀青、上胶、编联等步骤制作而成。虽然东汉已经发明了纸，但直到魏晋，简牍仍然是书写的主要材料。简牍相较帛、纸而言，易于保存，简牍的出土往往能够与传世文献互证。在此之前，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等秦汉简牍的出土，为补史证史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三国时期的简牍一直以来所见寥寥，长沙走马楼一次性发现如此海量的简牍，轰动全国。

史书上的“熟人”在简牍中出现

长沙与三国渊源颇深，东吴政权的奠基人孙坚曾任长沙太守，并以此为根据地举兵讨董，揭开孙氏一族称雄乱世的序幕。孙权称帝后，念及长沙为东吴肇起之源，又将其兄孙策追谥为长沙桓王。东吴时，今长沙市为长沙郡临湘县治所，东吴名臣步骘被封为临湘侯，封地正在此地。

走马楼发现的三国吴简，其内容大致包括佃田租税券书、官府文书、户籍记录、名刺、账簿等。根据内容推测，这批吴简可能主要是东吴嘉禾年间临湘侯国官员处理过的行政簿书，因为过期废弃而统一倾倒在这座井中，意外地保存到了1700多年后的今天。

从这些简牍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三国人物。如编号1556、20541的简牍上有“步侯”字样，“步侯”即时为骠骑将军、临湘侯的步骘。步骘在夷陵之战中曾奉命从交州北上益阳助战，讨平零陵、桂阳诸郡叛逆，封临湘侯，后官至丞相。步骘在长沙郡屯驻十年之久，对长沙有很大影响。

简牍中有多枚竹简中提到“大常”，即指太常潘濬。潘濬为武陵人，封刘阳侯，封地亦在长沙郡内。简牍中有“吕岱”“吕侯”“镇南将军”的记载，它们均指东吴名将吕岱。吕岱曾屯长沙沤口，协助太常潘濬讨伐武陵蛮。

编号1296的简牍还提到了“中书典校事吕壹”。吕壹是孙权后期所用酷吏，他以监察诸官府及州郡文书的名义罗织罪名，构陷朝臣，制造了一系列的冤案，导致东吴政治陷入严重危机。被吕壹弹劾的丞相顾雍，其封地醴陵就在长沙郡内，在走马楼吴简中出现吕壹的名字，很可能就和这场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关。

从走马楼吴简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与史料互为补充的历史细节。据《三国志》载，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三月，汉献帝改年号为延康，当年十月即禅位于曹丕，改元黄初。次年十一月，因孙权称藩，曹丕策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

此前学者多认为此时东吴应奉魏黄初年号，直至一年后魏吴决裂，孙权才改元黄武。但在走马楼吴简中，出现了历史上不存在的“建安廿六年”“建安廿七年”，可见在孙权统治的长沙郡，当地官员在年号使用上并未奉曹魏的“黄初”，甚至没有使用“延康”，而是将“建安”年号顺延使用了两年。这与唐人所著《建康实录》中“曹丕代汉称魏，号黄初元年，而（孙）权江东犹称建安”的记载吻合。

佃农租地合同、基层贪污案，琐碎公文丰富了历史的血肉

走马楼吴简记录的赋税、户籍、法律、屯田、书信等内容，看似是鸡毛蒜皮的琐碎公文，却为我们了解三国时代，尤其是社会基层的政治、经济、律法、职官等细节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比如，在走马楼吴简中，有2000多枚形状较大的木简，长50余厘米，宽2.6至5.5厘米，内容为东吴嘉禾五年、六年，当地吏民的佃田租税券书，被称为“嘉禾吏民田家莂”。“莂”如同现代常用的两联单，将佃农租地情况、纳税数量等数据一式两份书写，在顶端大书一个“同”字（或作为“同”字简写的几条直线），然后从中间一剖为二，一份留在官府备案，一份由租佃田地的农户保存。官府要核对时，将两份木简合在一起，核对顶端的“同”字能否合准，这也是今天“合同”一词的来历。

这些木简详细记载了东吴时期长沙郡临湘县佃户租佃土地的数量及向官府交纳钱粮、布匹等赋税的数额，可以称为我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经济券书。

研究者还发现了一则史书中无载、但在当时颇为轰动的大案——许迪割米案。在目前所公布的简牍中，多达500多枚都与该案有关。

许迪是临湘侯国的一名吏员，于黄龙三年被选中在陆口典卖官盐。嘉禾四年，许迪被发现有贪污行迹，盗割军粮一百一十余斛六斗八升。临湘侯国派录事掾潘琬、核事掾赵谭等官员对许迪进行“考实”，即调查审理。在审理阶段，许迪已认罪，但当长沙督军都尉前来核实案件时，他却突然翻供，称没有入库的粮米是他预留作为搬运、加工费的余米，自己并未据为私用，只是因为县吏使用刑讯，他不堪拷打，才被迫认罪。为配合翻供，许迪还指使其弟许冰篡改相关账目要簿，混淆视听。

此案遂致一波三折，长沙郡府相关曹司、中部督邮乃至长沙太守、郡丞，皆介入审讯中来，对案件重新核查。最终，案件真相大白，许迪伏法认罪，被判斩首于市，妻儿没为奴，其母因年过八十，依法免于连坐。这桩刑事案件从案发到审结，前后达三年之久，案情复杂，参与官员众多，是透视三国东吴长沙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情状的绝好个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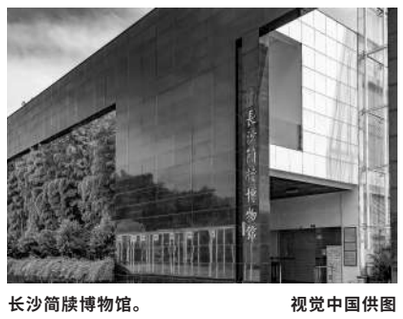
走马楼吴简记录的内容大多是基层政府的文书档案，它们一般不会进入正史的叙述中，而且在当时人看来也没有什么保存价值，定期要进行销毁。但正是这些被忽略的文字，却意外地穿越历史进入我们今人的视野。它们丰富了历史的血肉，让模糊的三国东吴社会逐渐清晰起来。

对学界而言，海量的走马楼吴简无疑是一座宝藏，对于简牍的清理、释读、整理、发表一直在持续进行。学者们从基层统治、经济管理、户籍制度、税收制度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

2007年，位于长沙地标名胜天心阁对面的长沙简牍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为走马楼吴简专门建设的博物馆。那些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早已归于尘土，反而是简牍上记载的文字，成为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真实的三国故事。

（作者系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出版有《乱世来鸿：书信里的三国往事》《列族的纷争：三国豪门世家的政治博弈》等）

吴简双面签牌。签牌是一种起标识作用的简牍，上书该类文书档案的类别或名称，并系于或搁放于归了类别的文书档案上，以供查阅。该简中部之契口即为系绳之用。 长沙简牍博物馆供图



长沙简牍博物馆。 视觉中国供图